

為國家保存文化

鄭振鐸搶救珍稀文獻書信日記輯錄

鄭振鐸

——著

陳福康整理



中華書局

為國家保存文化

鄭振鐸搶救珍稀文獻书信日记辑录

鄭振鐸——著
陳福康 整理



中華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为国家保存文化:郑振铎抢救珍稀文献书信日记辑录/郑振铎著;陈福康整理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6.4

ISBN 978-7-101-11301-3

I.郑… II.①郑…②陈… III.郑振铎(1898~1958)—生平事迹 IV.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40401号

书 名 为国家保存文化——郑振铎抢救珍稀文献书信日记辑录

著 者 郑振铎

整 理 者 陈福康

责任编辑 万 骏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
版 次 2016年4月北京第1版

201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张14 $\frac{1}{8}$ 插页4 字数300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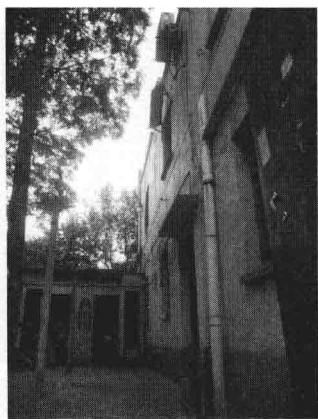
印 数 1-4000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11301-3

定 价 48.00元



抗战期间的郑振铎先生



上海，高邮路5弄25号，郑振铎1942至1945年在此居住。

一年后在友人的帮助下，搬至居尔典路（今湖南路）的一条偏僻的小巷（今高邮路5弄）内，住在小洋楼的二楼，有两间房，分作卧室和书房。一大片窗是朝南的，一大片窗是朝东的，推开窗口，满眼的绿色。我的书桌，放在南窗下面。有一天早上，房东同我说，到前面房子里去看看，望着这特高的围墙，我问道，这究竟是谁的住宅？房东道，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，这是周佛海的新居。

——郑振铎 《蛰居散记》

昨晚先生
昨不奉赴某處租金入戶。中元夜。待符咒。又朔間目已於平西。
代憐。不當于年祀。合是期星。個銷靈堂。尋本目。若得
者。均可安在不火。此皆月信之選擇。從二子之信部中。選得
一千九百餘部。均傳之分三。此二千九百餘神書。印五種以百元計
已近三方。俟中牒交核書。或不准以五百至千元都得一。而補本
部分則乃確以爲確。作價。如因國權必當錄之。庫特要補本的
在塔里木。及付均不易得矣。且恐功缺千金。亦不。甚足歸此。
查該書大抵傳與舊本。存之庫終二三冊。至稿有言云。此
情應備凡言二十冊。現五十餘部。即以明年部分而看。方志一册
幾至千金。以上層幅極厚者。而止此數。若欲外本。官氏類
是為之路。雖即明。今在在求書。日中者。其何多昂。若者
草。神農文編。廣成子要義。陰陽公案等。七海有房集等。
均非二百金可得而問鼎。亦有後漢草一部。亦所至八百

郑振铎手迹

原件现藏国家图书馆，粘贴、装订成五大册，封面“木音”两字，为张寿镛手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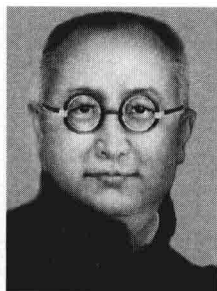
张元济



张寿镛



何炳松



徐森玉

上海文献保存同志会部分成员

抢救民族文献的珍贵文献

陈福康

—

郑振铎先生对中华民族文化事业作出过巨大的贡献。其中可歌可泣的一件大事，就是他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头挺身而出，发起并联合上海几位爱国老学者（张元济、张寿镛、何炳松等先生），与国民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（陈立夫、朱家骅先生）、中央图书馆（蒋复璁先生）及文献专家（徐森玉先生）等密切合作，在日本侵略劫火下秘密抢救和保全了一大批民族文献、珍贵古籍。这一“地下工作”本来人们所知不多，所幸在蒋复璁、张寿镛等先生分别精心呵护下，当年郑先生与张寿镛先生，郑先生与有关当局、中央图书馆之间的关于抢救图书的秘密往来的一批信函、报告、书目、账单等原始文件保存了下来（现正珍藏于海峡两岸的图书馆），而通过对这些原始文件的研读，可以使我们后人能比较详细地了解这一重大史实。毫无疑问，这些珍贵的书信、文件现在也已经成为我中

华民族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了。

关于这批文献，此前已经整理公布过一些，主要发表在两本学术刊物上，和出版了两本书：

一、《馆史史料选辑·古籍收购与集藏》，台北“国立中央图书馆”编，发表于1983年该馆馆刊新十六卷第一期《五十周年馆庆特刊》。其中公布了郑先生起草的“上海文献保存同志会”的九份工作报告等。

二、《郑振铎先生书信集》，署刘哲民编，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，收有郑振铎致张寿镛二百六十九封信（按，数目未必准确）等。

三、《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——郑振铎先生书信集》，署刘哲民、陈政文编，1992年学林出版社出版，收有郑振铎致张寿镛二百七十封信（按，数目未必准确）等。

四、《郑振铎致蒋复璁信札》，沈津整理，连载发表于2001年北京《文献》杂志第三、四期和2002年第一期。收有郑振铎致蒋复璁三十八封信及电文。

既然此前已经有人整理发表过这些了，那么，现在为什么又要重新整理出版呢？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：一、三十多年前台北“国立中央图书馆”的馆刊，一般大陆读者是看不到的；二十多年前出版的那两本书，也早已买不到了；十多年前的《文献》杂志，现在也不易寻找。而且，这些已公布的文献如果不汇编在一起，也不利于读者和研究者。二、更重要的原因，是上述这些公布的文本，主要是后三种，存在着大量的整理编辑的错讹，而一般读者甚

至研究者都未必看得出来。长期以讹传讹，实在也是对不起郑先生等前辈的。借用刘哲民的话来说，简直令人“有不寒而栗之感”。为了说明这一点，这里不得不举出事实来。这样，持有这些书刊文本的读者和研究者，在使用时也可以提高警惕。

二

台北“国立中央图书馆”《五十周年馆庆特刊》公布的“上海文献保存同志会”九份工作报告，由于我们没有原件的复印件，无法重作校对，主要只是在阅读中发现和纠正了一些错别字。例如人名“鲍菴顾”，改正为“鲍菴饮”；“徐勃”，改正为“徐燭”；“吴兔麻”，改正为“吴兔床”。再如书名“南需文定”，改正为“南雷文定”；“钱氏水云集”，改正为“钟氏水云集”；“种氏四种”，改正为“钟氏四种”；“天经或间”，改正为“天经或问”。等等。

其他三种文本则存在更多的问题。刘哲民，是可以写入现代出版史的人物（刘是建国前后上海出版公司负责人），他对出版郑先生书信做出的贡献应该肯定。然而非常遗憾的是，《郑振铎先生书信集》和《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——郑振铎先生书信集》这两本书中，在编辑、系年方面出现了很多的错误，而且，这些错误又全部被带进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郑振铎全集》里去了，这对后世研究郑振铎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误导作用。

《郑振铎先生书信集》乃影印线装本，三大册，启功先生题签，装帧朴素大方，郑先生手迹又很潇洒，令人喜爱。但书中错讹之多

实在令人遗憾！

这里先得讲讲该书最主要部分（即郑振铎致张寿镛信）的发现及发表经过。因为这本身对今后的研究者来说，就已是一件史料，而史实首先应该搞清楚。刘哲民在此书《编后》一开头写道：

1983年，在编《郑振铎书简》¹将近完成的时候，陈福康同志过访，谈起他在北京图书馆借阅有关郑振铎资料的一段时间里，曾发现一盒显微胶卷，系郑先生写给张咏霓先生的信，总共有三百多页，因为没有阅读的设备，无法详其内容。我知道张咏霓先生是国内著名财政经济学家、教育家。郑先生何以和他有这么多信，当时是很费猜想的。1985年，郑先生哲嗣尔康世讲来到上海，和他谈到这组胶卷的问题，尔康告诉我，他家里也藏有一卷，随即托人带了给我，我设法约略地阅读了一下，才知道这组胶卷是抗战时期，郑、张两先生为国家抢救版本古籍的通信，是一组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，因建议尔康设法向北京图书馆将原件复印一份。复印件寄到后，共有三百数十封，经过仔细阅读，才恍然大悟到：这些信正是郑先生在《求书目录》中提到的……

曾有不少朋友读了这段文字后感到殊不可解，便来问我：你本是为了研究郑先生而特地跑到北图查资料的，既然发现了这一胶

1 刘哲民编注，学林出版社，1984。

卷，为何连看也不看一下，不“详其内容”？说北图“没有阅读的设备”，岂非笑话？对此，我只能苦笑，因为我也对其所说感到莫名其妙。

这批书信我是 1982 年就在北图发现的，不仅当时就通读了胶卷，作了笔记，而且还看到过原件，还最早写文章作介绍并提议整理出版。1986 年《文献》第四期上，就发表了拙文《记北京图书馆所藏郑振铎日记和文稿》（此文写成则在两年以前，而刘哲民编《郑振铎先生书信集》出版于 1988 年 12 月），其中便说：“全部手稿中最值得珍视的，我认为当是被装订成五大本、封面题为《木音》的郑振铎 1940 年初至 1941 年底致张咏霓的 272 封信。”我在文中介绍了张的生平和这批信的保存经过，最后说：“笔者郑重呼吁，有关部门应将郑振铎的这批书信整理出版，这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，而且也是爱国主义的文献，同时对于台湾回归祖国也能起一定作用。”（这一“呼吁”，当然我也对刘哲民说了，只是我当时人微言轻，没有能说动出版社予以影印的力量。）而拙著《郑振铎年谱》（1988 年 3 月出版，开始撰写则在四五年前），就已将这两百多封信全部记入谱内。另外，刘文中说的郑尔康将胶卷“随即托人带了给我”，这个“人”正是我；而所谓“复印件寄到后”，其实也并非“寄”，也正是由我从北京带到上海的；甚至连此书封面的题签，也是我受郑尔康之托去北京师范大学（我的母校）启功老师家请启先生题写的。

《郑振铎先生书信集》除了主要收有致张寿镛的信以外，还收了致赵景深、张元济、唐弢、夏鼐、顾廷龙、徐森玉、刘哲民、徐伯郊、梁思永、郭若愚等人的信。在郑先生致后面一大批人的信的

整理中，也有很多的错误，但因为这些信大多与抗战时期抢救文献一事无关，所以这里只说致张寿镛信。

（一）失收

郑先生这批信的珍贵价值，不用多说；保存如此完好，也极为不易。因此，理应全部影印。可是，经我对照所作笔记，发现书中有四封郑先生的信被摒弃未收，不知何故。它们是：1940年3月23日、3月24日、3月29日、4月16日。这四封信的内容都很重要，拙著《郑振铎年谱》均有摘要，可参看。

（二）重收

书中第190页所收1940年9月3日一信，在第167页误作8月3日而重复收入。

书中第122页所收1940年5月22日一信，在第205页误作9月22日而重复收入。

（三）系时错误

郑先生这批信，原件都写明年月日三项，又保存完好，基本按先后顺序粘贴成册，所以本来不应该出现系时错误的。但不知为什么，编者仍会看错日期。上述重收者即是如此。另外还有：

书中第273页编为1941年4月2日一信，便是把6月看成了4月，实际应排在第308页6月2日一信之后（同日写有两封信）。我偶然对照原信照片，忽发现更为严重的错误是，郑先生在这封信的日期后面本写有“第二函”三字（这更证明是6月2日写的，因4月2日未见另有一函），但在影印本中竟然删去了原件中郑先生写的这样三个字。

书中第368页编为1941年10月31日一信，又把5日看成了31日。

还有书中第15—17页编为1940年2月23日一信，实际应是3月23日。郑振铎写的月份，似乎确实像个“2”字；但是，张咏霓将此信粘贴在3月23日一信之前（胶卷所拍顺序也是如此）。而3月23日一信，前无抬头（大概就是因为前无抬头，编者便以为此信前阙，最后索性就不收了），署名“振铎”之后有“又启”两字，因此这是补写的，前一信必亦为3月23日所写。只不过郑振铎将“3”误写作“2”，或者“3”的最后一弯写得不够清楚而已。

（四）错简、漏印

书中第97—98页，有编为1940年4月29日一信。两页连读下来，如不注意，文字也是很“通顺”的，读者便极易上当。然而请再翻到第170—171页，看看1940年8月8日一信，就会发现第170页与第97页是一样的！经核对原件，其实是书中漏印了4月29日一信的前一页，并将8月8日的前一页重印了一次。

（五）附件错编

郑先生的原信中，常常附有书目、账目之类，这部书中大多也影印了。但附录常常印错了地方，因而影响了研究和参考价值。

书中第4—5页的《文献保存同志会办事细则》，是极重要的文献，今附于郑先生1940年2月3日信后，编者肯定自以为这样编排不会错，因郑先生此信写了“办事细则已拟就”；但郑信中随后又写有“现送菊老一阅，明后日即可送上，请先生阅定”，那么，起码还是应该附于“明后日”的信后的。其实，郑先生此时提到的《办事细则》还只是他起草的初稿，而现在保存下来的则是请他人刻写、用红色油

墨印成的定本。因此，这份《办事细则》应该附于3月13日后面才对，因为此日郑先生信中写道：“办事细则已印出，兹奉上一份存查。”

书中第100—102页的瞿氏《铁琴铜剑楼书目》，今附于1940年4月30日信后；实际应附于第48—49页的4月2日一信之后，因为此信最后正写着“瞿目附上”。（按，这份《铁琴铜剑楼书目》字迹潦草，胶卷更难看清，再说也不是郑振铎写的，本书就不附录了。）

书中第160—161页的《今后购书之目标》《今后经费分配计划》二文，今附于1940年7月25日信后；实际应附于第163页的7月29日信之后，因为这封信中正写着：“兹拟就‘今后购书之目标’及‘今后经费分配计划’二纸，乞先生指正。”

书中第303—304页的十一种书目，今附于1941年5月27日“第二函”之后；实际应附于第301页的这一天的第一函之后，因为第一函中正写着：“计共十一种，兹另开一‘目’奉上备查”。

书中第112页所附书目，实际当附于第108页一信之后。

书中第143页所附书目，实际当附于第122页一信之后。

以上这些，书中都编排乱了，损失了附录的意义。

（六）重要附件失收

书中收入了书目、账目之类的附件，但却漏收了几件重要性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文件。

例如，郑先生转给张寿镛看的张元济致郑振铎信二封、何炳松致张寿镛信一封，正是当年张（元济）、何二公与郑公一起抢救文献而写下的大量书信中仅存于世者，珍贵无比。如今失收，实在令人惋惜不已！

还有，当年诸公为存放书籍而向他人租房的有关文书等，也很有史料价值。未予影印收入，也实在可惜。

另外，原信粘贴、装钉成五册，封面有张寿镛亲笔手书“木音”二字，极有深意和纪念意义（我认为当是“木铎之音”之意，郑先生小名“木官”），也理应影印出来才是。

三

《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——郑振铎先生书信集》一书，基本上就是上述影印本《郑振铎先生书信集》的排印本（因此，这本书中有不少信实际与“抢救祖国文献”无关），只是另外新增了几封信。刘哲民在此书《前言》中，承认前一种影印书“在编辑工作方面却出了不少的讹误”，甚至还痛心她表示“每披阅到这部书信集的时候辄有不寒而栗之感”。然而，令人遗憾的是，虽然《郑振铎先生书信集》存在的错讹令人“不寒而栗”，但本书在编辑上却并未对上述讹误做彻底的修正，只在极少几处作了改正（如寄张元济信的错简及漏页），但同时因为是排印本，却又新增了不少排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错误。一是错别字、错误标点甚多。二是信中添加了一些并非郑先生写的文字，却并不标明是编者所加。三是编者误系的年份大多连括号都不加，直接印在信尾，令读者还以为是郑先生自己写的年份。书中还有不少新增添的混乱。¹

1 如该书第379—381页一信，前一影印书中错系为1951年，本书编排次序照旧，却在信尾及目录中改为1952年，但是仍然是系错了。（接下页）

上文指出的影印本中的很多错误，在此排印本中几乎全部照旧，所以这些就不用再写了。而由于是排印本，又排错了很多字，这里就只能略举几个例子：如书中几乎所有的“已”字全错排成“巳”；第43页书名“八叉集”误作“八义集”（义字还排成繁体，尤为可笑）；第79页书名“甲申朝事小记”误作“甲申朝市小记”；第81页人名“蔡子民”误作“蔡子民”；第82页书名“《永乐大典》……‘李’字一册”，误作“永乐太典”，对“‘李’字一册”因看不懂而加上“（原信如此）”；第87页书名“石渠宝笈”误作“石渠宝籍”；第92页“不欲”误作“不願”；第95页“遍觅不获”误作“偏觅不获”；第97页书店名“文禄堂”误作“文錄堂”；第102页书名“建文朝野汇编”误作“建文朝野三编”；第107页“一木函”误作“一本函”；第112页人名“费子诒”误作“费子贻”；第145页书名“纂图互注荀子”误作“纂图互法荀子”；第171页书名“师友渊源录”误作“师友渊汲录”；第176页书名“琬琰录”，编者因不识“琰”字而空格；第176页书名“春秋属辞”，“属”字误作“寓”，“辞”字因不识而空格；第177页书名“陵川文集”，“陵”字因不识而空格；第177页书名“读史管见”误作“续史管见”；第187页“每苦时力不足”误作“每若时力不足”；第189页书名“艺苑卮言”误作“艺苑扈言”；第222页“分别部居”误作“分别部首”；第245页藏书楼名“宝礼堂”误作

（接上页）再如，本书第401—402页一信，前一书中系于1951年5月30号，未错；本书却莫名其妙地改为5月31日。